



刘锋焘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代前期词研究

昭君怨

昨日樵村渔浦
今日琼川银渚
山色卷帘看

老峰峦

锦帐美人贪睡
不觉天孙剪水

惊问是杨花

是芦花

憶當時西山爽氣共君對持手版王徽之桓冲去

美四印

憶當時西山爽氣共君對持手版王徽之桓冲去
問卿何署答曰似是馬曹問官有幾馬
馬如何知數又問幾死多少曰未知生焉
仕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微之不答直高
手版挂頤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鑑裁水曹詩興功業行飛霄漢郎有人偷
揚州賦梅詩稱山公居事何遜天監中爲水部郎
在揚州又唐張籍爲水部員外郎有詩名故
詩人例作水曹郎老杜愛酒晉山簡能詩何
書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老杜此華屋舍秋寒
氣奇漢此言致身雲漢之上
千里橫青眼言仍有寒沙歸去之夢填青眼
生之外言放適也阮籍能作青白眼因病酒橫
俗之士白眼對之山谷青眼聊因病酒橫
未官歸去且要比官能處通爽閑覽詩人類以

情雲翻雨覆千丈堆冰炭
薄何須高人一笑春風卷
一陣春風來卷地吹回落照
開山谷出門一笑大江橫
公自矜登日吾歟陳
敬如此餘子瑣瑣亦
舉小兒楊德祖餘子
無全目荀子平王東
思承嘉之子復王振
大風流豈落正始後
於中朝今子復王振
子敦鎮

金詞研究

松林題



金词研究序

霍松林

改革开放以来,雪化冰消,万卉争荣,“诗词热”席卷神州大地。然而由于传统诗词遭受数十年压抑,一朝解放,虽喷涌而出,声势浩大,但作者多新手,作品类习作,故就艺术质量而言,堪称上乘者尚寥若晨星。救之之道,除关心国计民生、深入现实生活等先决条件而外,便是广泛地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传统)以吸取民族精神和艺术经验。时贤高唱“创新”而对历代名篇未暇一顾,更谈不上研磨借鉴。其结果,只能是“欲速则不达”,徒然耗费时间与精力。新时代呼唤新诗词,“创新”是无可争议的;问题在于“创新”不应从零开始,而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基础愈博厚,对“创新”也愈有利。就词而言,倘能兼取两宋名家之长为我所用,则其“创新”便非“妙手空空”者所能企及;进而上溯下沿,精研唐宋金元明清乃至近代之词而究其源流正变、摄其声情气韵,则取精用宏,左右逢源,便与粗辨平仄、略识之无者不可同年而语了。

清人焦循论文学,认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易馥簞录》卷

一五)。王国维进而指出:“夫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自序》)认为唐诗宋词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当然不庸置疑。但对于治诗词的人来说,如果仅仅占领这两座高峰就感到心满意足,又如何能把握中华诗歌发展的历史轨迹而探其规律、究其得失呢?然而人们首先看中“一代之所胜”而穷幽探胜、心追手摹,以至忽略其他,这也是很自然的。就词而言,从“五四”迄今,对宋词的研究已成绩斐然,而对宋以后的词,则研究相对薄弱,金词尤其如此。

在一般人心目中,金朝不过是由一个兄弟民族建立的与南宋对峙的区域性政权,地域荒寒,文化落后,历时又短,词这种文采绚丽、声情并茂的文艺品种不可能在这里开出鲜艳的花朵。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就断言“金元工小令(曲)而词亡”。事实恰恰相反,女真族初建金国,经济、文化固极落后,然在灭辽、灭北宋以后,推行汉化政策,费用汉语言文字,重用汉族文人,提倡诗词歌赋,其最高统治者如完颜亮、完颜雍、完颜璟及其宗室完颜珣等,都以能词著称,影响所及,词家辈出,灿若群星。唐圭璋先生《全金元词》收金代词人70家、词作3572首,可谓洋洋大观。全国雄距北疆,气候严寒,山川雄莽,民风刚直,声乐粗犷,兼以“苏学北行”,东坡乐府伴以铜琶铁板,响彻朝野,故其词雄放伉爽,自成格调,于中华词史独放异彩。如完颜亮之《鹊桥仙·待月》、《念奴娇·咏雪》,雄奇豪犷,前无古人,堪称“创新”之作,今之高唱“创新”者正可作为借鉴。

80年代以来,一向被冷落的金词逐渐引起学者们的注意,

时有论著涉及,然全面、系统的研究著作尚付阙如。刘锋焘君有见于此,以《金词研究》为题,撰写出博士学位论文,受到答辩委员们的一致赞许,于1997年夏获文学博士学位。

这部论著,我认为有如下特点:

一、金代文献失坠过半,给研究金词带来不少困难。锋焘从文史结合的角度充分占有资料,考证分析,论从史出,既显示了深厚的史学、文献学功底,又体现了缜密的逻辑思辨能力和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如评论海陵王,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及后代一般文人,大抵以《海陵庶人实录》为根据,兼受通俗小说《海陵王荒淫》的影响,因而大加贬斥。锋焘则征引金人贾益谦、元人苏天爵及今人的考证资料,从大处着眼,对完颜亮其人其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二、金朝是女真族在北中国建立的区域性政权,在其历代君主倡导汉化以全面吸取先进文化的民族大融合中延续120年之久,从“未有文字”发展到文化繁荣。因而探讨金词,必须弄清其历史文化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作家心态和审美情趣。作者高度重视民族大融合产生的效应,把金词的萌生、发展、流变与女真族的汉化、汉族文人对女真族的认同过程紧密地联系起来,从大文化背景上进行阐述,处处以文人心态为中介,探微抉秘,点面结合,得出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作者将金初词与“北宋餘绪”相衔接,从“使金被留”的身世遭遇与金人“扬辽抑宋”、“重北轻南”的文化背景中审视金初代表词人宇文虚中与吴激的“恋旧情结”,并借刘无党“万里山川悲故国,十年风雪老穷边”的诗句来概括其心态,从而对其词作出了精当的评论。对海陵王时

期的词,则从女真族全面汉化、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入手,论述以蔡松年为代表的老一辈词人已完成其思想文化人格的转变,与金政权日趋合作,而成长于金源的新一代士子则昂扬奋进,从而影响其词作,使当时词坛呈现出一派全新景象。

三、作者把金词的发展划分为五个既有连续性、又有差异性的阶段论述其每一阶段的代表作家,并勾勒了传承关系和发展脉络,又把蔡松年、完颜亮、元好问作为重点,全面考察,从而展现了金词的独特风貌和卓越成就,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特别肯定的是:把前此被贬斥的完颜亮提到突出位置,从他向往汉族文明、推行汉化政策及其高扬的大一统意识等方面入手,高度评价其豪霸雄肆的词作,确当公允,是作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所取得的胜利。

这是力图系统、全面地研究金词的第一部专著,原始资料不多,可资参证的论著较少,撰写过程也相当匆促,因而很难做到尽善尽美;进一步充实、完善,还有待于坚持不懈的努力。但它的出版,已有显而易见的现实意义:第一,它可触发同行专家的兴趣,或补其不足,或纠其失误,把金词的研究引向全面、深入。第二,它可以向当代词坛新手们展示金词的独特风貌及其传承、演变规律,在继承传统、借鉴前人方面开拓视野、启迪心智,从而以其日益精美的“创新”之作,吐万民之心声,发时代之强音,为振兴中华诗词,建设精神文明做出贡献。

1998年初春写于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

目 录

导 论	(1)
-----------	-------

上编 金词的准备期——金初词

第一章 借才异代:金初词产生的文化背景	(45)
---------------------------	--------

金代初期的文化建设——女真建国前后文化发展轨迹扫描——从重视文化到文治思想的产生——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借才异代——辽、宋入金之文士对金政权的不同态度

第二章 金初之主要词人:宇文虚中、吴激	(79)
---------------------------	--------

风云变幻的生平——困厄危殆的生存状态与痛苦郁闷的心态——开风气之先的词作——深情绵缈的故国家山之思——脱胎北宋的抑郁悲慨之词

第三章 金初其他词人	(117)
------------------	---------

刘著——高士谈——邢具瞻——张中孚

小 结	(126)
-----------	---------

下编 新气象的出现——蔡松年 与完颜亮时期的词

第一章 大一统意识的高涨与昂扬奋发的士人心态…… (133)

大一统意识的空前加强——正统观:大一统意识
的基础——迁都伐宋:大一统意识的具体实施
——新气象的出现:大一统意识的反响——昂扬
乐观、奋发向上的士人心态

第二章 蔡松年及其词作…… (148)

从守节彷徨到消释超脱的人格转化——开金代百年
词运的萧闲词——客怀归思与隐逸之趣——汴京情
怀与镇阳乡思——高情远韵与晋风苏词——身世之
感与风流柔情——清雅词风与小令体制——文词相
配与独立美文

第三章 完颜亮及其词作…… (215)

一位一心向慕先进文明的女真霸主——与众不同
的身世——开拓型君主——向慕先进文化——卓
异不凡的词作——本色自然的胸臆流露——充盈
鼓荡的豪霸之气——一种崭新的审美风范

第四章 完颜亮周围的词人…… (241)

蔡珪——赵可——邓千江

小 结…… (247)

主要参考书目…… (251)

后 记…… (253)

导 论

金朝,是12世纪初到13世纪前半期在我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它与南宋划淮而治,成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以时间论,金王朝持续了120年;以空间论,它北起外兴安岭,南到秦岭—淮河一线,其版图比南宋还要大;以国势论,它以其实力迫使南宋、西夏向其屈服纳贡,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亦向其臣服,可谓兴盛一时。在文学创作方面,金朝虽不如南宋文学那么繁荣,但也是代有才人,作家辈出。仅以词而论,唐圭璋《全金元词》就收有金代词人70家,词作3572首之多。然而,对金词的研究,向来却十分薄弱。有鉴于此,笔者选定金词这一课题,力图对金词之发展情况作以尽可能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并据此对金词作以整体性的评说。本书就是这项努力的一部分成果。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先来简要地回顾一下金词研究的历

史与现状。

现代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可以说是从五四运动以后才开始的。而具体到金词这一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金词之研究成果寥寥,研究深度也很有限:吴梅《辽金元文学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对金代文学分为文家、诗家、词家、曲家四个部分进行论述。吴氏前此二年出版的《词学通论》(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亦分专章论金元词。此外,还有刘毓盘《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出版)分专章论辽金词,王易《词曲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出版)在《析派》一章中亦专节论“金诸词家”,又有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上海大陆书局1933年出版)亦分专章论金元明词。这些论著,为后人研究金词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其学术史的意义不容低估;而就研究本身来说,却还显得有些疏略,如王易《词曲史》基本上只是罗列了25首金人的词作。这一时期金词研究的重大成果,当首推缪钺先生的《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发表于1936年《词学季刊》第3卷第2、3号)。此《笺》对《彊村丛书》刻本《遗山乐府》在考订笺释的基础上加以编年,旁征博引,颇见功力。惜此《遗山乐府》乃是元好问在金亡当年(1234年)自编,其后所作未及收录,故非元词足本,而缪笺亦偶有疏失之处。建国以后的30年,金代文学的研究仍比较冷落(这一时期,台湾的金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元遗山研究则比较活跃)。80年代以来,金代文学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态势,通论性的著作有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张晶《辽金诗史》(东北师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具体作家的研究尤以元好问为重点与

热点,出版了好几部研究专著与论文集。但具体到金词这一领域,成果犹嫌太少。8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主要如下:马兴荣先生的《词学综论》(齐鲁书社1989年出版)专章论金元词,史论结合,颇多创获。黄拔荆《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亦设专章论金词,比之刘毓盘《词史》、胡云翼《中国词史略》,论述更为详尽。张晶《辽金诗史》金代部分各章后分专节论金词,则是年轻一代学者以一种新的视角对金词进行评说,故亦颇多新意。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著作还有夏承焘等编注《金元明清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贺新辉辑《元好问诗词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出版),贺氏《元好问诗词研究》(中国妇女出版社1990年出版)亦收有论遗山词之论文一篇,又有姚奠中主持点校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出版),还有南京大学出版社与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本《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及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词鉴赏辞典》(下册收有金词)。此外,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年出版了吴庠遗作《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又有香港所出《金元词史》(笔者未曾寓目),亦很值得一提。就单篇之论文来说,成果亦嫌太少,就笔者所知,专论金词的论文(不含单篇赏析文章)总数超不过20篇,另有几篇论文论述某些作家(如蔡松年、完颜亮等)的诗作时也连带论其词作,但数量不多。这些论文,有些是极有分量的,如金启华先生的长篇论文《金词论纲》(发表于《词学》第四辑)即是如此。

总的来说,先驱们在金词的研究方面已经有了可喜的收获,但还有着大量的工作有待我们去进一步完成。笔者就是想在继

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努力做一点开拓。

笔者认为,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尤其是词这种以抒情为主的文学体裁,必须先研究、揭示与其密切相关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与文人心态。而研究金朝文学,尤其要首先研究女真统治者对文化的态度,了解金王朝文化的发展(因为直到太祖立国的时候,女真人的文化还处于一种类似于结绳记事式的半荒漠化状态,连文字也没有,而短短百余年内,其社会制度、文化水平的飞跃性发展是很令人诧异的。)本书正是按着这样的思路进行论述的。

以全局和整体的眼光观照金词,首先就遇到一个对金词的分期问题。关于金代文学的分期,此前有三分法,如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即将金代文学分为前期(海陵王以前)、中期(世宗、章宗时期)、后期;又有四分法,如张晶《辽金诗史》即将金诗之发展分为金初时期、大定、明昌时期、南渡时期与金末时期;还有五分法,如詹杭伦《金代文学思想史》便将金代文学思想的发展分为金初时期(自太祖收国至海陵正隆末)、世宗时期、章宗时期、金末时期(卫绍王大安初至哀宗天兴末)与金亡时期(金亡至元好问逝世前后)。具体到金词这一领域,主要有两种分期法:以往论金词者大都将金词分为三个时期,即金初时期(或称前期)、世宗、章宗时期(或称中期)、金末时期(或称后期),如夏承焘等《金元明清词选·前言》、金启华《金词论纲》以及业师马兴荣先生的《词学综论》等都持此种分期法;80年代末,唐圭璋、钟振振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前言》在此三分法的基础上又将金词分为四个时期,具体的说,就是将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后从

“金初时期”单列出来,作为金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而以蔡松年为本期的词坛泰斗和代表作家,指出,“真正开有金百年词运的,实惟蔡氏一人而已”。笔者在充分吸收和继承前人研究之成果的基础上,将金词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金初太祖至熙宗时期(实际上主要是太宗、熙宗时期)为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词人基本上都是由宋入金的文人,他们以“宋儒”的心态在金地写词,词作主要写对北宋故国的怀念与羁滞异邦的悲苦之情,其写作特色也多承北宋词坛。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作金词的准备期,其意义是对以后金人写词起了“开先河”的作用。至于同时而稍后的蔡松年词则体现出与这些“宋儒”之词有所不同的特点。蔡词主要承继东坡词风,写自己的高情远韵,对金源一代词坛影响极大;而海陵王完颜亮的词作则更是豪放不羁,充满一种力的美感,为中华词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风范。在完颜亮周围也有一群词人表现出与此相同的词风。因而我们把蔡松年与完颜亮时期的词称作金词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其显著特征便是词作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气象。至大定、明昌时期,为金词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词人较多,但总的来说成就并不太高。本期词坛的特点是,词人们多写其承平时代的雅趣闲情,亦多闺情闺怨、离愁别恨之作。这自然是太平年月文人们吟咏的最多的话题。宣宗南渡前后可以划作金词发展的第四个时期。与当时时代转折性的巨大变化相比,本期词坛则更多的表现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不过也有变化,这就是词艺在趋于深化,而词境更趋于醇雅。金亡前后为金词的最后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词人们都经历了亡国的时代巨变与心灵痛苦,金亡后大都不仕新朝,归

隐林泉,以遗民自处,故其作品便多写亡国之痛、黍离之悲与归隐之情。本期词人以元好问最为杰出,有了元遗山,金词便有了一个辉煌的结束。

下面,我们试就每一时期词坛之基本情形,作以简要的勾勒。

二

太祖、太宗与熙宗时期,是金词发展的初期。严格地说来,这一“金初”的概念应该是指太宗天会年间到熙宗皇统六年之前。因为金初的词人基本上都是由宋入金的文人,他们天会间始入金朝,而到熙宗皇统二年,金初的代表性词人吴激去世,至皇统六年,另两位重要词人宇文虚中、高士谈被杀,他们所创造的词坛特色也就随着他们的生命一起结束了。我们的看法是,这一时期是金词的准备期。

在具体论述金初词之前,我们不得不首先考察一下金初之文化建设情况,因为女真人由最初的没有文字,“其乐惟鼓、笛,其歌惟《鸛鹄曲》,第高下长短如鸛鹄声而已”(《金志·初兴风土》),迅速发展国内作者辈出,文学创作成就斐然可观,这与女真统治者对文化的重视与建设是分不开的。

有关史料告诉我们,从阿骨打领兵抗辽时起,女真统治者就以极大的热情“留心于文事”,积极吸收先进的契丹文化和更为先进的汉族文化,力图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摆脱那种原始的文化状态。就大的方面而言,太祖、太宗时期,除过国家制度、典章

礼仪等方面的建设外,大金国的开创者们在具体的“文事”方面主要做了三件事,即:造文字、兴庠序、设选举。天辅三年八月,完颜希尹等制成女真字,这是女真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天会元年,金人占领了燕云地区以后,又承继以前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开科取士,这又是金朝史上的一件大事。金朝科举从此开始,并为以后几代君主所继承和完善,“终金之代,科目得人为盛”(《金史·选举志》)。不过,当时因“方事军旅,未遑讲也”(《金史·礼志》),进一步地吸收先进的汉民族文化而提高本民族的文化素质这一工作,尚未及全面展开。

而到了熙宗时期,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熙宗不满足于太祖时之“未易改旧俗”及太宗时之“一依本朝旧制”,针对当时已由战时转向和平时期的形势,熙宗在对汉文化的吸收过程中逐渐确立了他文治的思想,他说“太平之世,当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金史·熙宗纪》)。在文治思想的指导下,他以坚决的态度进行汉化改革。天眷年间,在官制方面首先进行了重大改革,史称“天眷新制”。同时,熙宗又仿效中原王朝,着手建立新的封建秩序、典章礼仪;又亲祭孔子庙,倡导尊孔,从各方面开始接受中原封建文化。至于具体的语言文字、诗词歌赋,熙宗更是着力倡导。他亲自制成女真小字,与完颜希尹所制的女真大字一同颁布使用。他早年便“喜文辞,……所与游处,尽文墨之士,有未居显位者,咸被荐擢,执射赋诗,各尽其所长以为娱”(《大金国志》卷九)。即位以后,更是不仅仅停留于太祖、太宗时的“留心于文事”,而以坚定积极的态度推行汉化政策,实行文治。从此,金代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至于金初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与途径,便是“借才异代”。这“才”主要是指文士这一人“才”,同时也包括图籍文物等方面。

早在天辅二年,金太祖就下令:“国书诏令,宜选善属文者为之。其令所在访求博学雄才之士,敦遣赴阙”(《金史·太祖纪》)。天辅五年十二月又令斜也“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发赴阙”(《金史·太祖纪》)。这两道诏令,实际上是把取文士、收图籍作为一项国策规定下来。而在当时形势下,文士与图籍只能是取诸“异代”了。所以,天辅七年,太祖给都统杲的诏令就说:“新附之民有材能者,可录用之”(《金史·太祖纪》)。

太祖、太宗时期,在紧张的战争期间,收图籍、取文士的工作从未放松。图籍的收取主要是针对文物丰富的宋王朝。至于取文士的工作,则早在灭辽的过程中就开始了,并且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软硬兼施,罗致了不少原辽朝和宋朝的文士而为己用。到了熙宗时期,又进一步地借用这些已有的人才进行诸如政治制度、典章礼仪等方面的改革与文化建设。这可以说是比太祖、太宗时期更向前迈进了一步。

金人虽然罗致了大批原属辽、宋的儒生文士,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由辽、宋入金的文人,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思想观念不同,他们对女真统治者、对金政权的态度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态度,又反过来影响了女真统治者对他们的不同态度,二者互为因果。

本来,女真统治者(至少是一部分)就对由辽入金的文士(包括渤海人及燕地汉人)和由宋入金的文士持有不同的态度。对渤海人,他们是很信任的,因为他们认为“女直、渤海本同一家”

(《金史·太祖纪》);对燕地汉人,他们也是信任的;而对宋地汉人,情况则不同了。太祖、太宗及宗望、宗幹等人对宋人尚无太多偏见,而当时执掌大权的宗翰等人则对宋人另眼看待,以极其反动而暴虐的政策对待他们。比如,禁止汉服,强令削发,不如式者便被处死。同时,又将汉人当作奴隶一样对待。天会十年夏,宗翰更在白水泊导演了一场科举丑剧,将赴试的举子大大戏耍了一番。这样一些情况的出现,使得那些本来还有着求仕欲望(不管其对金政权的态度如何)的人也丧失了信心和希望。于是,使得更多的汉族士人对金政权采取一种不合作乃至坚决抵抗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刺激得本来就不信任他们的女真统治者对他们更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政策。在金初对知识分子的选拔和使用上明显地具有扬辽抑宋、重北轻南的特点,科举考试也实行“南北选”的办法,予以区别对待;这又反过来使得这些文人更加采取各自不同的态度(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熙宗乃至海陵时期)。而这种态度、这种心态,又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文学创作,影响到其作品的内容、情调、乃至风格等诸多方面。

金初词人,主要是由宋入金的文人,而以宇文虚中和吴激为代表。就词作的成就而言,尤以吴激词为最高;而宇文虚中的意义,更在于他当时以文坛盟主的身分作词。

宇文虚中(1080—1146),字叔通,成都广都(今四川成都西南)人,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登进士第。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年),虚中以祈请使的身分出使金国,被留不遣。后仕金,与韩昉俱掌词命。虚中虽然仕金,但却不忘宋室,最后图谋举兵复宋,事泄被杀,事在皇统六年(1146年),时年67岁。